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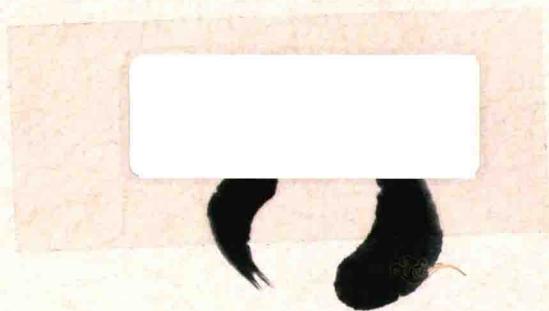
传播博弈论

——文化符号学基础

Communication Games:
The Semiotic Foundation of Culture

[美]爱德华多·内瓦 著

王泽霞 宁海林 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传播博弈论

——文化符号学基础

Communication Games:
The Semiotic Foundation of Culture

[美]爱德华多·内瓦 著

王泽霞 宁海林 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字:11-2015-6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博弈论:文化符号学基础 / (美) 内瓦著; 王泽霞, 宁海林译.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6. 6

书名原文: Communication Games: The Semiotic Foundation of Culture

ISBN 978-7-5178-1373-6

I. ①传… II. ①内… ②王… ③宁… III. ①文化传播—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8230 号

Eduardo Neiva: Communication Games, The Semiotic Foundation of Culture
© Walter de Gruyter GmbH Berlin Boston. All rights reserved.

传播博弈论——文化符号学基础

[美]爱德华多·内瓦 著 王泽霞 宁海林 译

责任编辑 田 慧 黄静芬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373-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部分 正则博弈

第 1 章 冲 突	27
第 2 章 合 作	57
第 3 章 契 约	86

第二部分 先祖博弈

第 4 章 起 源	135
第 5 章 性与信号	159

第三部分 个体博弈

第 6 章 策 略	195
第 7 章 博 弈 者	220
结束语	258
参考文献	275
译后记	317

绪 论

《传播博弈论》是对文化是只存在于人类社会群体中的规则体系这一概念提出的挑战。本书作者认为,这种传统的文化观念不仅赋予习俗所塑造的表征——符号以不必要的主导地位,而且必然会阻碍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传播博弈论》从不同侧面对文化学与符号学的一些传统观点进行评论,提出一个能够取而代之的非约定主义的概念。本书将皮尔士(Peircean)的符号学与达尔文(Darwin)关于性选择是生物生命核心的观点融为一体。在承认性选择不断产生具有利益冲突的个体机制的基础上,《传播博弈论》阐述了博弈理论对符号学研究和文化传播学研究的积极贡献。

《传播博弈论》不赞成对“文化习俗构建并决定社会执行者身份”这种令人不悦的重复讨论。尽管约定主义者对任何类似生物学的东西过分敏感,指责每一个受生物学发现而得到启发的人是决定论主义者和政治反叛者,但是他们不承认自己的理论和分析是一种关于社会生活的保守概念。约定主义者一直以隐匿的方式扮演着文化决定论主义的角色。

文化决定论假设每个社会执行者都是集体思想的直接产物,但文化中流传的规则不过是打着“社会和谐”的幌子来制造强大的凝聚力和无法抗拒的强制力的一种方式。如果这是真的,那就说明文化规则先于并决定着信息在社会中的传播,同时决定着它们的生产与接受。有人可能会问:这个概念有什么问题?的确,把文

化规则视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几十年前,在人类学思想曙光的照耀下,这个假设的吸引力源于它似乎可以解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对于文化决定论者而言,人类群体是由一些似乎是任意的规则指导的,而动物在整个自然界似乎也是如此。文化决定了人类天性与动物天性的不同。提出这种类似概念的人都是在重复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994)最初在1762年提出的理论。卢梭认为,自然世界并不接受改变,往往不存在自由,因此也不存在人的尊严。

决定论主义者起初把矛头直指生物学理论,认为它是草率的决定论,随后,又斥责任何把生物学作为切入点的分析者。根据卢梭的理论,自由只存在于受合同关系制约的人类交际中。谁能否认这个理论呢?社会群体间的比较结果足以证明非统一的习俗所造成的差距是不可忽视的。虽然文化是不同社会群体间相互比较的产物这一结论似乎是正确的,但是若完全接受这个概念,文化规则就会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成为社会运行的代言机构。矛盾的是,如果自由是人类群体的特征,那么这种文化概念也不可能是完整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s, 1973)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76)等人类学家认为,人类文化是不能够进行比较的。任何文化普遍性的结论不仅是错误的,也是陈腐的。在否定人类普遍性特征之后,格尔茨(1973:49)指出,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问题的最普遍根源。人类每一种个体行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都是个体文化的总体反映。因为个体文化现象是不能比较的,所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一词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

然而,如果我们人类的自然进化是非常近期的事,那么为什么人类群体会是无法比拟的?人类的生命形式怎么可能与其他生物生命的机制截然不同?奇怪的是,文化决定论者的唯意志论和宗教创造主义者的愤怒让他们在否定达尔文的生物学上产生共鸣。《传播博弈论》的主张是:一个人类社会群体不仅与另一个人类社

会群体有众多共性,也与其他动物群体有许多共同点。人类与动物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差异绝对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

关于时间

人文学科与生物思想之间的鸿沟并非基于事实的原因,而是理论上的偏见造成的。最能体现这种偏见的是人文学科和生物思想对自然和进化过程的构想。

远在卢梭把文化与自然分离之前,人类的时间性(即人类生活的时间结构)被认为是与自然时间完全不同的。柏拉图(Plato)把历史的流动视为退化和丧失,是一个类似于自然生命中所发生的不幸衰落过程。柏拉图声称,研究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形式领域,最正确的哲学方法是把那些仅仅是暂时的、具有自然性和人性的东西排除在外,把注意力转移到万物永恒不变的事物上。总而言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时间的流动同样可以被视为是改善、自由和创新的表现。无论人文学科对人类历史评价的最终答案是什么,围绕时间话题的讨论源于一种缺乏批评和错误的直觉:对后天习得文化与先天继承生物之间非关联性的阐述。即使是批评后柏拉图主义传统的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996),也把自然与人类的时间性分割开来。海德格尔认为,用自然事件来描绘时间概念是无益的,所以他的这种攻击是合乎常理的。他强烈反对用事物来理解时间的概念并认为这种理解方式绝对偏离人性的本质。

人类的时间性有别于时钟的分针和秒针的运转。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人类时间性的神圣在于它超越事物的束缚。他认为把人类时间性简单地理解为时钟运转就偏离了人类存在的本体论,自然时间和人类历史是不同的概念。海德格尔理论的核心潜藏着将自然时间与人类时间分离的危险。

把自然时间与人类时间完全分离是不切实际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自然界中的个体,无论是否是人类,都遵守同一个时间规则。在达尔文提出其理论之前,自然与文化的区分被视为一个

既主观又模糊的门槛。但是,如果把果蝇基因与人类基因结构进行对比,人们就会发现生物之间是惊人的相似。然而,在遥远的过去,人们却认为生物与生物之间就像互不交集的平行线,毫无共性。因此,一个多世纪以前深受吹捧的人文学科的一些理论很容易会受到挑战。随着科学的发展,达尔文的理论逐步证实生命过程的假设,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一百多年来在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惜的是,达尔文在撰写进化理论时并没有阅读孟德尔(Mendel)关于遗传学的论著。这本书也许会让达尔文理论更加完善地阐释有性生物群体的差异性和遗传性在世世代代传承过程中的变化(Mayr, 1990:109)。这是19世纪学术界的憾事之一。尽管如此,达尔文理论的地位并没有受到丝毫撼动。无论如何,达尔文出版于1859年的理论奠基之作《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979)提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观点:尽管生物受到自然选择和遗传突变的影响,渐渐转化成不同的个体,但它们的演变能够追溯到同一个根源。

虽然被确立为有机生命的原理花费了一些时日,但进化阐释的选择单位和中心单位却变成有竞争力的个体机制,并在某种更深层意义上,这些个体甚至等同于复制因子,即基因。然而个体绝不是物种的总体。进化选择单位,无论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复制,必须用单数来定义。用群体定义选择单位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与个体单位相比,群体区别能力较差;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独特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生物机体的身上都蕴藏着他们祖先的历史,而且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个进化的新开端。展望未来,我们能看见生物个体演变成不同的生物,但回首过去,对于它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看见的却是同一个起点。

生物时间是双向的,时间的流动从一个源点分流出不同的形式。生命的过程既是多样性的,也是共同性的。这种观点是对人文学科关于时间、历史和记忆等传统概念最激进的批判。这更像跳房子游戏中的步伐,进化论对生物历史演变的理解摆脱了直线

坐标的局限。时间的流动是不断地被绘制和再绘制的过程,并在两者之间不停地徘徊。因为个体行为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任何个体行为的意义超越其生物整体。所有自然生命都是由“进化自由”决定的,人性也是如此。

虽然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进化程度不同,但它们都具有开放性特征。在时间的洪流中,历史进程有数不尽的变化。这种变化无论是好还是坏,历史都在无止境地转变。在进化论中,期待群体进化是不切实际的。个体成功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一个生物群体的进步。尽管如此,时间所揭示的人类文化产物总是无可避免地和不可忽视地被改变。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如此多样化的人类习俗和社会机制。达尔文认为,所有生物的来源都是一样的,个体间的差异是受自然选择的影响而演变成的。根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观点,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尽管自然界演变的速度可能较为缓慢,但它也存在同样的规律。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并非完全一致,但是所有生物体内,除了蕴藏着它们自己所属的物种历史之外,还拥有所有生命体的历史。DNA 是所有生物体在结构上共同拥有的基本成分的重组体。比如说,我们人类的大脑中就有爬行动物大脑的痕迹。如果每一个生命体都拥有全部生物生命的历史,那么整体主义所主张的任何其他行为先于个体互动行为的观点就不可接受了。自 20 世纪起,集体意识和整体主义意识形态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起着主导作用。这种理论阐述从认知过程而言是荒谬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是没有依据的。

整体意识形态的历史坚守

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解释,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知识,整体意识形态理论所假定的外因和公认的社会利益左右个体行为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所有个体行为和社会执行者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都是他们生活时代和社会的被动反映。

整体意识形态理论假定任何比个体强大的力量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塑造历史的某一瞬间或某一文化中所产生的思想。这种力量

是一个统一性概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无论它是一种时代精神,还是一种社会阶级、一个民族、一个族裔、一个社会群体,或是一种文化,但它至少是集体主义的。任何基于整体意识形态理论视角对社会生活的阐释都具有整体性。

黑格尔(Hegel)和马克思(Marx)认为,评估文化信息应该考虑对它们来说是外部的因素。这是他们在19世纪中构想出的观点。与此同时,达尔文正在为“生物的命运是个体性的”这个发现而绞尽脑汁地思考着。以与达尔文相反却又惊人相似的方法,黑格尔和马克思把人类历史设想为一个进程。对于黑格尔(1949: 801—808)来说,历史通过理性地战胜对立面的历史时刻来展现其进程。这是一种同时掺杂着保护和超越的混合体,德语称之为“扬弃”(Aufhebung)。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整体是对“绝对精神”最真实的表达,超越并主宰时间。换言之,历史是对立和统一地朝着一个预定方向而产生的交流。尽管马克思也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进程,但他却认为把一种纯粹理想化的精神视为历史精髓是荒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暴力是解决那些把人类逼到对立阵营的经济矛盾的必然方式。也就是说,历史完全是为了经济生存和统治进行的挣扎(Marx and Engels, 1848)。

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 1998)中揭示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并论述了该观点如何变相地表达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策略和利益。然而,马克思自己构思出的理论也同样承载整体意识形态。马克思有力地争辩说,人们必须要通过阶级利益来理解他们所生活时代的哲学思想含义。正如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的无政府主义,或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所认为的宗教乃是对“我之所以为我”的思考和对这个瑰丽之梦的承认。马克思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自己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位哲学家,而是当作一个为争取人类自由而奋斗着的积极而自觉的参与者。

马克思对黑格尔提出的“历史会自动而理性地克服社会矛盾”这个伟大的假设并没有丝毫崇敬之情,而是提出一个既可以替代政治行动又可以避免阶级间互相斗争的建设无产阶级社会的方法。在斗争结束之后,社会生活一定会被改变,并栖息于乌托邦共产主义的整体,不受任何私有财产和分裂的经济压迫。马克思可以自豪地宣称对黑格尔思想的彻底颠覆。的确,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历史理解进行了抨击,认为黑格尔的阐述应该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入手。要理解黑格尔哲学就必须回答一个最根本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尽管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抽象的,但什么是它的真正核心?马克思运用知识社会学谴责黑格尔是超越他自己的社会动力的产物。另外,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过是用来肯定保守政治目标策略的一部分,但马克思与黑格尔真的截然不同吗?黑格尔被动的传统主义因马克思的出现而遭到摧毁并被取代。然而,马克思所做的一切也是有限的。他推翻了一组传统习俗却用另外一组取而代之。当无产阶级专政变得清晰而明确时,新的颠覆资产阶级习俗的规则应该被纳入社会结构中。传统主义依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共同之处:黑格尔的历史思辨哲学恰恰成为马克思的经济集体主义的整体意识形态。

至少在一个方面,马克思的知识社会学应该被认真对待。认为人类知识体现于历史和社会之中,思想影响及其实际效果与人类资源的利益竞争无关的想法是天真的。思想并不是在象牙塔里或干旱的草地上萌芽发展的。人类理论对社会执行者不具有剥夺和占有的这一假设无疑是过于简单化的。这是一个不应该被轻视的假设。人类智力活动的社会和历史特点是不可否认的,但如果假定所有思想不过是被动地和不加批判地反映它们的创造者或执政社会阶层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偏见,那么这一观点还需进一步探讨。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批判和修改任何一组概念都将是不可能的,各种形式的知识和文化都将会停滞不前,能够取代主流理论的概念永远不会被提出。每一个思想系统都会存在于一个封闭的、

无变化的永恒世界里,如同生活在钟罩子里一样。

这种历史和文化整体论是一种惊人而强劲的趋势,囊括了多种关于文化和知识的概念。其内涵囊括了黑格尔关于一个时代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历史是持续、合理、不可抗拒地朝着一个他认为是世界精神的意志方向发展的理论精髓,这一点对自由的诠释的确是崇高的,但却是一种凌驾于社会执行者个体特征之上的有关范式和认识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学出现之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62)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72)对这种历史概念的理解表示赞同。

仅仅采纳个人的观点而不彻底地改写约定主义、历史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假设,是无法保证能够避免整体意识形态的束缚的。例如,虽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似乎可以从个人命运和历史的角度的促进对个人的解析,但它依然散发着约定主义的整体性意味。弗洛伊德或许已经成为一名坚持手持一把伞的、被时代淘汰的维多利亚绅士,但他的思想在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77)的著作里重生。当代的拉康理论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弗洛伊德早期提出的生物概念的否定之上。拉康的新弗洛伊德思想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理解再一次对生物自然和人类进行了区分。对于拉康而言,社会象征性和传统秩序塑造了每个人的心理认知。孩子对象征式阉割的恐惧必然会影响他的性格。孩子的性欲应该被抑制,这样他才会完全被社会化。文化规则对个体具有主宰作用。通过使用一个微妙的措辞——或许这个词在法语之外的语言里是不可能有意义的,雅克·拉康指出,对社会和文化规则的意识是依赖于对父亲名字(Le Nom du Pere)的认识。这是一个把“父亲名字”和“对父说不(non)”的意义紧紧相融在一起的双关语。法语的“名字”和“不”的发音几乎无法分辨。另外,拉康所说的并不是真正的父亲,而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宰者,比如说,像上帝(The Father)一样的象征性存在。真正的父亲不过是社会不可缺少的文化规则的助手而已。一个完全摆脱文化

束缚的人不是抽象的人物就是精神病患者,一个无法约束欲望和思想的受害者。介于精神病和神经病之间,人们要么缺乏约束,要么过分地被约束。无论如何,他们完全被文化主宰着。

整体意识形态理论的误导性替代方案

当总体性和共时性体系把符号在社会交流的作用放在次要位置时,其结果使交流的主体——人的存在变得微不足道。个体间的互动被看作是反映并从属于已被设定并允许社会执行者之间进行交流的方式。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生活中具有实际效力的部分从来就不是执行者,而是创建和促进社会互动的文化。社会事实来自于其他社会事实,而这种事实无法被简化为每个个体的个人心理状态。

正因如此,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1895年发表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宣称,社会的整体并不等于各个部分的总和。这样的总体与众不同:它的属性不等于其构成部分的属性。他明确地表示,社会事实的共时性是集体表征的主要特征,而被运用的符号受社会规则的引导和主宰。

不同于19世纪的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甚至是达尔文等痴迷于历史研究视角的社会思想家,涂尔干否认历史进步的主导地位。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要识别出在此时此刻主宰着执行者思想的社会法规,而对于与他同时代的一些历史主义者而言,过去似乎比现在更有实质意义。用涂尔干的话来说,重点在于理解那些导致具体社会现状的直接原因。历史分析太过于偏离社会学的分析要求,理解那些导致社会稳定状态的因素要远比研究历史因果的涟漪重要得多。受涂尔干的影响,法国社会学学派把分析的重点从历时性转向共时性。这是产生社会阐释的前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这是社会执行者真正的生活方式。社会群体是围绕那些引导个体选择的集体表征所特有的行为而建立的。

虽然历史和传统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特定的历史时刻是如何走到目前这一步的,但是当前的事实永远是更为重要的核心。

社会执行者的言行举止永远是受与社会发展方向一致的社会规则约束的结果。个体要在群体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服从集体意向。拉康关于符号秩序对个体意向的预先支配作用的评论是对涂尔干社会概念的纠正。社会经验的稳定取决于社会规则与秩序的胁迫,在社会中流通的符号直接反映那些引导它们意义和形式的传统规则。

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号学是对人类社会所使用的符号规则进行研究的科学。该研究深受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索绪尔的两个学生——巴利(Bally)和薛施霭(Sechehaye)根据听课笔记所整理出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频繁出现的社会学术语反映出来。在巴利和薛施霭提供的索绪尔的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的讲稿中,索绪尔宣称,人类交流中每一个被使用的符号都存在于一个共时符号的规则系统中,是规则使用的结果。这些规则是一种有创造力的结构,是人类交流得以实施的决定因素。

关于时间这个元素,索绪尔同意涂尔干的观点。索绪尔对“现在”的强调与涂尔干的理解有关联,但却比简单地借用后者的观念复杂得多(Yong-Hoi, 2002)。在索绪尔看来,时间依然是重要的,这说明语言并非是动态或静态的。语言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那些历经时间的洗礼却依然不变的东西上。正是这种稳定性决定了值得被优先考虑的东西,这就是语言规则系统如何呈现于发言人脑海中的一个缜密的观念。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永远不可能是发言人的言语(parole),而是驾驭和制约个体言语行为的规则体系。涂尔干社会学和索绪尔语言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很久以前就被注意到了。朵罗谢夫斯基(Doroszewski, 1933)指出,当索绪尔把语言(langue)标记为社会共有的、比实际的言语更为重要的规则系统时,就是在重申涂尔干对个体表征和集体表征的区分。集体表征创造了社会事实。对于索绪尔来说,语言结构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是言语行为中的社会部

分,不受个体意志的支配。语言是一个施加于社会执行者的规则体系,任何语言结构的基本轨迹是“它是通过集体的使用而被强加于个人的”(Doroszewski, 1993: 90)。法国社会学学派的整体主义假设在索绪尔的理论中清晰可见。维萨克(Bouissac, 2004a, 2004b)在一个更为新近的关于索绪尔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贡献的评价中指出,索绪尔认为语言(*langue*)结构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概念。它是一组源于随心所欲并且受发言人的意志支配的常规符号系统。如果语言结构是一组常规符号系统,那么很明显它是后天习得的,然而其学习的过程被遗忘了:否则,它不可能在运用过程中如此自动展现。此外,被遗忘的也就被忘记了,只有这样语言才可能不知不觉地成为主宰发言者的力量。维萨克(2004a: 11)把语言(*langue*)当成一个悖论。根据涂尔干社会学的研究,这个想法是很符合逻辑的:每个个体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有意义的是社会契约式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又是推动常规的力量。

许多《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读者因为忽视了涂尔干对索绪尔的影响,所以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缺乏透彻理解,误认为符号学理论开启了一个相对论的、可能是自由主义者的、几乎是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生活理念。但如果整体表征作用于塑造个体意识的传统规则,那么这怎么可能会发生呢?当读者读到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本质的章节和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论点时,如果断章取义,就会得出这个奇怪的结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结论是有问题的: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 1966: 49—55)阐述了该论点的不准确性。他指出,符号或许缺乏明确的目的,但它一定被语言使用者看作是一个必要的表征。索绪尔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强调类似于关于人类文化不可通约性的观点。从表面上来看,所有的语言似乎都是无法互相比较的:它们就像无法跨越的藩篱,或是无法反照对方的镜子。人们不记得小孩子学习语言是丝毫不需要正式辅导的。不仔细阅读索绪尔理论的读者满足于“符号之所以能够被它们的使用者辨认,是因为它们是社会群体共有规则体系产物”的解

释。只有常规是重要的,而且它们有可能会改变:它们具有任意性。卢梭所说的合约性社会实践因这样的理解方式而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涂尔干对索绪尔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社会学和语言学的学科领域。索绪尔吸取涂尔干的理论精髓,将人类交流实践和互动模式意义的理解简化为对主宰人类的符号研究。由于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1945, 1966)对涂尔干和索绪尔的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将两者有机融合,人类学不仅为语言研究提供描写古老民族语言的素材,而且还引发出其学术目标很可能就是找出那些隐含于社会表征底层的规则。

就连历史也被赋予验证规则和主导时代常规的任务,尽管历史阐释永远都是依靠推理和假设的,但过去只有通过现在遗存的符号才能够加以了解。每一个历史时期之所以能够统一都是因为它拥有共同的形式规则。这就是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假设。历史符号需要解释,不过怎么样的解释才能够构成历史?对于金兹堡来说,历史编纂学是传统而严格的符号表征理论的产物。这一点在金兹堡的两篇文章——《高潮与低潮:16和17世纪违禁知识的主题》和《提香、奥维德和16世纪性描绘》中显而易见(Ginzburg, 1989)。在第一篇文章里,金兹堡分析的主旨是说明一个对立性基质(高对立干于低)是存在的,这一点与大部分典型的解构主义分析是相似的。第二篇文章论述了代码概念与之前有关对立结构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在金兹堡的两篇文章里,历史学家正在打造一个专注于过去的约定主义人类学。约定主义似乎是无处不在的。

经过久远的时间——一个多世纪后,社会胁迫这个对涂尔干如此重要的概念被中立化,并经常被忽略,但以约定主义符号学为根源的涂尔干理论并没有被彻底否定。现代一系列标榜文化研究的文学探索,例如媒体研究、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等仍然假设集体表征对个体的主宰。文化研究相信个体是集体表征的结果,后

者有足够的塑造个体身份和构建社会基础的力量。如果不相信传统规则凌驾于社会执行者之上,那么社会结构的说法也就毫无意义。如今,时代精神及其世界观、阶级统治,甚至是无意识的创造性功能都是过时的话题——尽管最后的创造功能话题相对而言并没那么过时。关于人文学科目前表现为明显的约定主义符号理论的趋势还从来没有被公开讨论过。当务之急是废除规则 and 传统惯例创造社会实践以及社会执行者通过或服从预先规定的符号完成社会交际活动的结论。

博弈,一种取代方案

因为“博弈”这个词语在本书的书名以及三个主要部分——“正则博弈”“先祖博弈”“个体博弈”的标题中反复出现,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对“博弈”概念的定义进行解释。本书所用的博弈概念源自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合著的巨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ur, 1944)。根据他们的深刻见解,博弈(game)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个词在日常生活所表达的通俗之意。参与博弈的人,即博弈者,在彼此互动过程中所做出的选择决定他们冲突的结果,即谁胜、谁败。根据冯·诺伊曼早期提出的模式——如今被称为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利益冲突体现为一名博弈者战胜另一名博弈者。

在冯·诺伊曼大规模的数学论证中,一个特别令人兴奋的部分是博弈论在各种情况下永远都能够提供最适合、最有效的策略。博弈论并非仅限于娱乐互动的分析,它能够应对数之不尽的情景:除了劳资谈判、拉选票的政治辩论、股市的资产浮动、社会群体或国家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以及外交活动。它还包括各种利益冲突,如拍卖、讨价还价、商讨、房地产交易、追求者在求爱过程中用到的策略,这在恋爱游戏中是司空见惯的。在人类社会发生的所有情形中,利益冲突双方通过预测对方的攻略来优化自己的策略和计划。博弈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关系理论,要充分地理解博弈论就